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中国军事典籍外译研究专题

译释学视域下《六韬》军事术语英译路径研究

吴海峰, 刘性峰

(南京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六韬》作为兵学圣典,被列入《武经七书》,其军事术语对于表征中国传统军事知识体系具有重要价值。较西方军事术语而言,中国古代军事术语有其特殊性,具体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科学范式、多义灵活的语言表征、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军事术语特殊性基础之上,运用译释学理论,对《六韬》聂送来和索耶译本中的军事术语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六韬》军事术语的译释路径可依据傅伟勋提出的创造诠释学来展开,遵循语境译释、批判译释、创新译释三条路径。采用语境译释有利于文本回溯,助力术语实现返源;采用批判译释有利于视域融合,助力术语实现续合;采用创新译释有利于理念升华,助力术语实现拓新。

关键词:翻译;译释学;《六韬》;军事术语;英译路径;语境译释;批判译释;创新译释

中图分类号: H 315.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5.01.005

在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的当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外国文化“走进来”已然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军事术语作为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还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语言表达、战略思维以及军事思想上的独特差异,对于促进“兵学西渐”和“兵学东传”的双向互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正是由于中西方军事术语在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从而无法做到完全互译而没有任何意义的损失^[1]。所以有必要寻求一条新出路来打通中西之学,架起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此外,作为中国古代军事术语的重要载体,中国军事典籍的英译研究广度、深度和角度均有待拓展。首先,从研究广度来看,中国典籍英译虽有

近 290 年的历史,但其重文学轻科技的特点导致中国古典诗歌、戏剧等体裁的英译本较多,而中国科技典籍作品的英译本偏少^[2],更不要说军事典籍作品的译介情况。加之《孙子兵法》的独特历史地位,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翻译传播方面,相较于其他军事典籍,它都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导致《六韬》、《孙臆兵法》等其他重要军事典籍被束之高阁、乏人问津。其次,就研究深度而言,中国典籍英译多集中于军事思想、战略理论等宏观层面的解读,像术语、译者等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匮乏。这种研究的不平衡在文献检索结果中得到了体现:截至 2024 年 12 月,在 CNKI 和 WOS 中输入关键词“典籍翻译”分别检索出 1776 条和 1517 条结果,而输入“典籍术语翻译”时,结果仅为 71 条和 25 条。这一数据差

收稿日期:2024-12-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科技典籍术语的语境化英译研究”(21BY072);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的英译与诠释研究”(2021SJZDA090)

第一作者简介:吴海峰(2000—),男,安徽合肥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典籍翻译、术语翻译研究。

E-mail:1907167949@qq.com

异表明术语层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以推动中国典籍英译的整体学术发展。最后,中国典籍英译的角度也亟须拓展。当前,生态翻译、目的论、概念整合等传统理论仍是国内英译研究的主要理论,学界还可关注交叉学科理论和多元学科理论指导下的英译研究^[3],这种新视角可以为军事典籍的翻译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支持,促进译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解与接受。鉴于此,笔者以中国军事典籍《六韬》为研究对象,选取《大中华文库》^[4](聂送来译)和《武经七书》^[5](拉尔夫·索耶译)(Ralph D. Sawyer)两个英译本,从译释学的角度对比分析其中的术语英译路径,以期为《六韬》术语英译研究提供新视角。

一、中国古代军事术语之特殊性

中国古代军事术语的特殊性是阻碍中西方军事思想平等交流互鉴的关键因素,所以十分有必要对其特殊性进行系统梳理,以促进中西方军事思想的对话与融合。正如褚良才^[6]所言,古代军语之研究,乃为汉语史研究领域内一片广袤之待垦地,中国语言宝库中一颗璀璨之遗珠。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武经兵书,汗牛充栋,卷帙浩繁,众多珍贵的军事术语与思想在历史长河中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垦与挖掘。其根源在于这些术语本身附带的特殊性,使得中西方军事术语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有限。基于此,笔者将围绕科学范式、语言表征、哲学思想三个层面,对中国古代军事术语的特殊性展开论述。

(一)科学范式的特殊性

“范式”这一概念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进行了系统阐述。从本质上讲,范式是指在科学研究中广泛认可的理论、应用和方法的集合,它为特定的科学领域提供了模型和标准^[7]^[16]。就西方而言,其科学范式往往呈现出自下而上的模式,即从具体的现象出发,通过逐步分析和推理,构建出抽象的理论体系。这种通过定义实体并在抽象思维中进行判断、推理、分析和综合的方式,通常被称为“概念思维”^[8]。与西方概念思维相对,中国古代军事术语的科学范式则通常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模式,强调整体性和宏观指导原则。《周易·系辞上》云: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意即圣人通过洞察天地深奥之理,将其譬拟成具体的形象或符号,用以象征特定事物的意义。这种从整体入手、以象传意的方式,正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认知模式——“象”思维。举例来说,《六韬·军势》曰:“资(势)因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此处强调了“奇正”的运用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依据敌我双方的变化以及局势的不同发展而随时调整。通过从整体出发,抓住战场中的微妙变化,指挥者能够在“奇正”之间自如切换,体现出高度的宏观战略眼光和对整体局势的精确把控。这种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为军事决策提供了系统性的指引,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深刻智慧,也为现代战略管理带来了重要启示。

(二)语言表征的特殊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语言是纠缠着精神的物质。^[9]^[24]这说明语言与思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特定的语言特点必然会引发特定的思维模式,而特定的思维模式也必然会展现出相应的语言特点^[10]。鉴于此,中西方语言表征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科学范式中窥见。中国的语言表征往往具有多义性和灵活性,这与中国文化自上而下的整体观念密切相关。《六韬·论将》云:“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此处的“兵者”既关系国家安危,又决定生死存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兵者”一词该做何解释?是士兵、兵器,还是战争?如果脱离语境,单从术语本身入手,恐怕很难给出准确的答案。在军事典籍中,类似“兵者”这样灵活多义的表达比比皆是,这不仅仅是中国文化注重整体性的反映,更是古汉语语言特点的生动体现。中国人善用隐喻和修辞,寥寥数语传达出“言有尽而意无穷”、“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六韬·国务》曰:“利而勿害,成而不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这种对偶和排比的句式简洁有力,却又扑朔迷离。利害、成败等六组词语从一方面道出“言有尽”,另一方面却留下了何者为利、何事为成的“意无穷”。这种修辞手法的应用更是给典籍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得后人解读这些经典时,需要通过深入的文化理解和思维探索,才能真正把握其中的深意。这与

西方单义明确的语言表征形成鲜明对比,造成了双方表达方式的明显分野。

(三) 哲学思想的特殊性

《易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无形为形上,器有形为形下。无形故虚而不可见,有形则实而可见。但是道寓于器之中,器为道之体现。此话虽说明了“道”与“器”的一般区别,却未将二者割裂开来,反倒进一步指出了“道”与“器”的内在统一性。吴晓明在论述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时指出,如果将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根基,那么道器不割、体用不二则是中国哲学始终运行其中且一以贯之的基本建制。^[11]这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高度契合。因为“道”、“体”代表宇宙的本质法则,类似于“天”作为自然界的最高力量,而“器”、“用”作为道、体之体现,与“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相对应。从中国古代本体哲学出发,天人合一的思想还贯穿于“理气”、“阴阳”、“五行”等概念之中。以阴阳关系为例,《六韬·鸟云山兵》曰:“乌云之阵,阴阳皆备,或屯其阴,或屯其阳。处山之阳,备山之阴;处山之阴,备山之阳”。该例中的“阴阳皆备”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指挥者通过将阴阳相结合,以灵活的阵法应对复杂的战场环境。这种布局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适应,也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概而言之,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贯穿于“道器不割”、“阴阳互存”等概念之中。它不仅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核心理念,也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体系的基础。

二、译释学理论概述

自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以降,佛经翻译迎来第一次高潮,“译”、“释”两个概念开始以相结合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但译释作为一门学科,以“译释学”的名义出现在大众视野,还要从21世纪初说起。刘华文在论及“翻译名学辨”时指出,在翻译过程中,汉语的多义性和其所承载的思想逻辑往往被西方语言的单义性所消解。^[12]以“译”字为例,汉语中“译”通过“音谐义近”可延展丰富的语义网络,如异、夷、释、易、移等。然而,若将“译”翻译为英语的“translation”,原本复杂的语义关系被简化为“移

译”,导致多义性被遮蔽或掩盖。由此可以看出,“译”字本身不仅仅是语言转换的工具,其内涵还蕴含着“释”的成分。正是这译中含释、释中寓译的复杂交融,为译释学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根基。笔者将通过“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三个方面,逐步对译释学进行论述。

(一) 何为译释

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标志着翻译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年来,随着中西方译学的不断发展,国内开始涌现出部分学者,对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展开反思与讨论。牛云平在寻绎中国译释学的过程中,发现中国译论的内核术语“翻译”和西方译学的核心术语“translate”有着不同的语义基因,导致“翻译学”的内核意涵深受“translate”一词的诱导与辖制,局限在中外语言之间的比对与转换。^[13]为了将中西方翻译研究的概念区别开来,她建议采用“中国译释学”的说法。虽然目前国内对译释学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如刘华文、叶君武对汉学域界内的哲学典籍译释学进行了讨论^[14],牛云平、杨秀敏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译释学做了概述^[15],徐黎、李德俊探索构建典籍翻译批评话语的译释学路径^[16],但所有这些研究都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观点:翻译和诠释相互依存。诠释学自诞生以来便与理解、解释及翻译紧密相连,其内涵中本就包含翻译的意义。而任何翻译理论与实践又都无法回避诠释的问题,因为翻译的过程本身蕴含着理解与诠释的双重特质^[17]³⁷。由此不难看出,译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有对原文的理解和解读,又有原文到译文的翻译转换,还有译文的表达产出^[18]。译者的阐释与翻译过程密不可分,彼此交织,难以完全分离,故称之为“译释”^[19]。

(二) 为何译释

安乐哲曾认为,在中国这种没有西方超越意义的文化背景下,强行将翻译与诠释区分开来是自相矛盾的。^[20]¹¹⁴一方面,译者需要通过诠释厘清中西方术语的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中西双方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通约,译者必须通过“创造性译释”来应对术语翻译中的难题。此外,典籍类文本有其自身的特性,它们往往以简练、概括的

风格呈现,包含大量的隐喻和留白。这种简约和留白的特性不仅使得文本在传递信息时高度凝练,还为诠释创造了更大的空间。诚如余光中所言,中国古典文学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汉字的独特性质。^{[21]6}一方面,汉语的语法具有极高的弹性和韧性,主语往往可以省略,动词甚至可以不出现。另一方面,汉字一字多用,极为经济。名词没有单复数之分,动词不区分时态,省略的主语也不标明人称,这些特点共同赋予了中国古典字词在语法和意义上极大的灵活性和可能性。因此,对典籍术语的解读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而应该深入到文本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中去。也正是这种对文本多层次理解的需求,使得译释学成为研究典籍术语不可或缺的工具。

(三) 译释何为

刘华文在对典籍译释学作总体构想时,给出四条建构路径:经学译释学、创造的译释学、本体译释学以及文本译释学。^[14]其中,经学译释学重视对哲学经典的考据,创造的译释学关注深层意义的还原,本体译释学侧重揭示译释过程中的形而上学维度,而文本译释学则聚焦于不同哲学典籍在翻译中的诠释特点。鉴于本研究的初衷是架起中西兵学的桥梁,突破中西军事术语交流壁垒,实现意义的互通,因此本文以“创造的译释学”为主要分析路径。创造的译释学是由美籍华人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诠释学延展而来。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创造诠释学包括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个层次^[22]。王宝峰曾指出,这五个层次分别指涉原思想家或原典的文献考证、语言分析、注疏历史、批判继承、创造发展等渐次升高的内容,分别隶属于前诠释学原典考证、析文诠释学、历史诠释学、批判诠释学以及创新诠释学的范畴。^[23]结合《六韬》译本自身特征,本文将基于意谓、当谓和必谓三个层次,分别从语境译释、批判译释与创新译释三个维度来探讨中国古代军事术语的译释路径,致力于实现返源、续合和拓新的效果。

三、中国古代军事术语译释路径

(一) 语境译释

语境译释是指在翻译过程中,通过综合考量

术语的概念背景、语言环境和文化内涵,确保对原文的准确理解和再现。语境是术语的自然栖息地,术语本身所呈现出的复杂性不断对语境提出新的要求。基于交际术语学的语境化策略将概念、语符和交际作为认知术语的不同路径,为应对术语英译中的语境复杂性问题的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24],对助力术语实现返源起到了重要作用。下面从概念语境、语言语境、文化语境三个角度对语境译释展开论述。

1. 概念语境译释 概念语境可以定义为一种综合性的框架,强调不同概念之间的系统性和层级关联性。在这个框架中,各个层次的概念不仅相互独立,还通过特定的逻辑关系相互影响与支持,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解体系。

(1)原文:“角”声应管,当以白虎;“徵”声应管,当以玄武;“商”声应管,当以朱雀;“羽”声应管,当以勾陈;五管声尽不应者,“宫”也,当以青龙。(《六韬·五音》)

聂译:When the Jiao note responded in the pipes, they would employ the forces on the right flank to launch an attack from the direction of White Tiger, i. e. from the west, against the enemy. When the Zhi note ... in the rear ... Black Warrior, i. e. from the north, against the enemy. If the Shang note ... at the front ... Scarlet Bird, i. e. from the south, against the enemy. If the Yu note ... in the middle ... Hooked Formation, i. e. from the middle, against the enemy. If none of the four notes responded in the pipes, it was the Gong note. Then they would employ the forces on the left flank ... Green Dragon, i. e. from the east, against the enemy.

索译:If the *chiao* note responded among the pipes, it indicated a White Tiger. If the *cheng* note responded in the pipes, it indicated the Mysterious Military. If the *shang* note responded in the pipes, it indicated the Vermillion Bird. If the *yü* note responded in the pipes, it indicated the Hooked Formation. If none of the five notes responded in the pipes, it was *kung*, signifying a Green Dragon.

聂送来在处理诸如白虎、玄武、朱雀等术语

时,展现出较强的系统性和层级关联性。每个术语不仅被翻译为其对应的名称,还结合了具体的方位和战术意义。例如,白虎代表西方,指从右侧发动攻击的力量。这种翻译方式不仅传达了每个术语的字面意义,还通过方位的解释,使得它们在战术上的应用一目了然。聂译构建了一个逻辑框架,使得读者能够理解这些术语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升对古代军事战术的整体把握。相比之下,索耶采用了直译的方式,而未提供任何背景或解释。这种方法虽然保留了术语原有名称,但却削弱了这些术语之间的关联。

2. 语言语境译释 术语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它受到纵向历史和横向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语言语境的作用在于将术语置于具体的使用场景中,对其进行细致的考察和分析,从而确保源术语翻译时的语义选择更加准确,使其具有语境适应性。

(2)原文:垒门拒守,矛戟小橰十二具,绞车连弩自副。(《六韬·军用》)

聂译: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fense of the gates to fortifications, there are twelve spears, twelve halberds, and twelve small shields, and they are supported by winch-powered linked crossbows.

索译: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fense of the gates to fortifications, there are small [mobile] shields with spear and halberd [tips affixed], twelve of them, and winch-driven, multiple arrow crossbows for self-protection.

在分析“矛戟小橰”这一概念时,聂送来和索耶的理解呈现出明显的偏差。聂送来将“矛戟小橰”视为三种独立的兵器——矛、戟和盾,单独列出并进行描述。相比之下,索耶则将三者合并,视其为一体化装置。索耶的注释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点,他认为:“尽管称作‘小盾’,它们实际上可能是相当大的,并且装配在可由数人推动的车轮或战车上”。这一注释使读者了解,术语中的“矛戟小橰”并非单独的武器,而是兵车上的综合防御装备,具有具体的战术功能。这种解释更加符合原文的语境,也反映了语言语境在术语翻译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六韬新说》的相关印证,“矛戟小橰”确实指代“一种设有矛戟和小型防盾

的兵车”^{[25][155]},而非单独的武器。索耶通过注释提供了更多背景信息,使得这一术语的功能和实用性更加清晰,体现了语言语境对术语精准理解的决定性作用。

3. 文化语境译释 中国古代军事术语展现出与西方军事术语迥然不同的文化特征。这种独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导致跨文化交流中的理解障碍,从而为翻译工作带来挑战。基于文化语境的合理译释可以有效地补充必要的文化信息,降低读者的认知负荷,确保相关术语的概念得到有效传播。

(3)原文:斋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授斧钺。(《六韬·立将》)

聂译:Then he should observe vegetarianism for three days. After that, he goes to the Ancestral Temple, bores the tortoise shell to divine an auspicious day, and hands over the fu and yue (battle-axes) to the general.

索译:Thereafter, to prepare for the chosen day, observe a vegetarian regime for three days, and then go to the ancestral temple to hand over the fu and yueh axes.

在翻译“斧钺”时,聂送来和索耶均采用了音译加释义的策略,分别将其翻译为“fu and yue (battle-axes)”和“fu and yueh axes”。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保留了原术语的音韵特点,还提供了清晰的释义,帮助读者理解其功能和文化背景。索耶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详细的注释,深入解释了斧钺的历史与形态特征,这种补充信息使读者对该术语的理解更加全面。两位译者对“斧钺”的双重处理,体现了对文化语境的重视,他们不仅承担了传递信息责任,更在促进文化理解与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 批判译释

批判译释对应创造的诠释学的当谓层次,意指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为原思想家说出什么。这是一种视域融合的方法,即通过当代的视角重新审视并揣摩历史时期作家的思想和意图。但这种揣摩并非随意猜测,而是建立在对原文的深刻理解和有依据的分析之上。在批判译释的框架下,译者通过对原文的批判性反思与分析,实现对原文的创造性延伸,以此将历史文本置于现

代语境中获得新的意义与解读,最终达成续合的效果。

(4)原文:日月、星辰、斗杓(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谓天阵。《《六韬·三阵》》

聂译:If you deploy the arm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sitions of the sun, the moon, the stars, and the handle of the Big Dipp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weather, this is referred to as the Heavenly Deployment.

索译:When you accord with the sun and moon, the stars, the planets, and the handle of the Big Dipper—one on the left, one on the right, one in front, and one to the rear—this is referred to as the Heavenly Deployment.

在该例中,聂译和索译均将“天阵”翻译为“the Heavenly Deployment”,但索译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注释,提出了有关“星辰”可能特指“晨星”(通常为金星)的观点,并进一步讨论了现代评论家如何解读这一章节中的天文现象。(Note: Although the translation indicates “stars and planets” in general,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the “morning star” is intended, which would provide exactly four items with which to orient the deployment. Modern commentators, however, tend to deemphasize what they apparently perceive as the nonscientific aspect of this chapter, preferring to interpret these phenomena in terms of winds and weather—contrary to the rich tradition of military formations and heavenly phenomena.)因此,聂译虽准确,但未能充分展现原文中潜藏的哲学和象征意义。而索译则通过注释的方式,不仅解释了“晨星”作为具体天体的可能性,还对现代评论家的解读进行批判性反思,指出他们倾向于将“天阵”与气象和风向挂钩,而淡化了天文学成分。这一批判性分析通过现代学术视角对传统文本进行重新审视,既保留了原文的历史文化背景,又引入了当代对天文现象与军事策略关系的重新解读,从而实现了原文思想的创造性延伸。这种现代性的解读虽然跨越了时间轴线,确是一种对传统军事思想的再审视与重塑。

(5)原文:既以被山而处,必为乌云之阵。

《《六韬·乌云山兵》》

聂译:If you have to deploy your troops in the mountains, you should deploy them into the “Birds and Cloud Formation”.

索译:If you have already occupied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you must prepare the Crow and Cloud Formation.

所谓乌云者,鸟散而云合,变化无穷者也。在翻译“乌云之阵”时,聂送来采用了直译的方式,力求保持原文的结构和意义,传达出鸟类迅速灵动的特点。而索耶则将“鸟”具化为“Crow”,这一处理方法体现出批判译释的特征,巧妙地将古今视域相融合。一方面,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日中有三足鸟,月中有玉兔。因三足鸟为黑色,形如乌鸦,便有了“乌飞兔走”的说法,形容日月如梭,变化无常。这一点正契合了“乌云之阵”所蕴含的战术灵活多变、如鸟散云合的意象。另一方面,乌鸦在现代文化中常被视为死亡、厄运的象征,这种象征意义与战争的残酷性不谋而合。原作者在写作时,未必会将鸟与乌鸦联系起来,但现代诠释者用乌鸦来象征变幻、战争等意象,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读,给人以一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感觉。

(三)创新译释

创新译释对应创造的诠释学的必谓层次,这是一种通过创造性突破对原思想进行深化和救活的译释方式。它强调引入启明观念的力量,克服原思想的局限与矛盾,提出超越性的解释。这种译释方法从原作者的“已说”导出诠释者的“应说”,实现思想的拓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完成古人未竟的事业,从而在不同文化和时代之间建立更深层次的共鸣与联系。

(6)原文:火战。《《六韬·火战》》

聂译:Incendiary Warfare.

索译:Incendiary Warfare.

在《六韬》中,火战作为一种战术形式,其防御性特征与《孙子兵法》中的进攻性火战有所不同,这一差异在索耶的注释中得到了特别强调。(Note: Although Sun-tzu devotes a chapter to incendiary warfare, his focus is on aggressive actions rather than the defensive employment of fire in desperate situations.)虽然两位译者都选

择了直译“incendiary warfare”,但索耶通过添加注释,映射出“不主战”的思想,展现了火战在不同文化与历史背景下的多维含义。《六韬》本身作为一本兵学著作,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发前人所未发。但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无斗、大兵无创,致力于实现止戈为武。西方所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一论断,同样蕴含着控制冲突的思想。而索耶的注释所凸显出来的“慎战”理念,恰恰与当今全球“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高度契合,反映出古代兵法在现代语境下的再生与跨时空的思想碰撞。这种翻译策略不仅有助于对古代兵学思想的再解读,也促进了对军事伦理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与应用的深层反思。

(7)原文: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宫、商、角、徵、羽。(《六韬·五音》)

聂译:There are twelve pipes. Among them there are five major notes: Gong, Shang, Jiao, Zhi, and Yu.

索译:Now there are twelve pipes, with five major notes: kung, shang, chiao, cheng, and yü.

“宫、商、角、徵、羽”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五声音阶,相当于现在简谱中的 1(Do)、2(Re)、3(Mi)、5(Sol)、6(La)。在中国古代军事中,这五音对应着五个方位的兵力部署,具有深刻的战术内涵。聂送来采用音译的方式,成功保留了中华

文化的精髓,同时还有效传达了这些音符与军事布局之间的紧密联系。索耶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策略,他没有直接使用西方音乐体系中的“Do, Re, Mi, Sol, La”,而是采用了威妥玛式拼音,这一选择虽源自西方,却同时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的尊重。与此同时,他还在注释中指出了五音和五行的紧密关系,实现了五音、五行、五方在军事领域的大融合,进一步凸显了“五音”的中华本根性。这种平等交流互鉴彰显了在多元世界中,各国文化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发声并被尊重。这样的交流方式不仅丰富了各自的文化视野,也为构建和谐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结语

古今中外,术语翻译活动屡见不鲜,但军事术语的译介却相形见绌。通过选取集中反映中国古代军事智慧与战略思想的《六韬》,本文剖析了中国古代军事术语在范式、语符和思想上的独特之处,进而引出这种特殊性导致的不可通约性需要解释性话语的介入。为了实现军事术语的返源,可以通过基于概念、语言、文化三个层面的语境做出译释。而要实现古今续合,甚至是当代的拓新,则需要更深层次上发挥批判性视角与创新性视角的作用。笔者借此抛砖引玉,希冀对推动中西兵学互通与构建典籍译释学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 [1]邱德胜,彭家锋.库恩论“不可通约性”及其对文化互鉴的意义[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78-83.
- [2]林宗豪,王宏.古代科技典籍英译本现状及成因的传播学阐释[J].中国科技翻译,2017(3):60-63.
- [3]刘雨蓉,郑玉荣.数字人文视域下国内科技典籍英译研究回顾与展望(2000—2023):以 VOS Viewer、CiteSpace、Voyant Tools 和 Python 为工具[J].中国科技术语,2024(3):74-83.
- [4]聂送来.大中华文库:六韬(汉英对照)[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
- [5]SAWYER R D. The Seven Military Classics of Ancient China[M]. Boulder:Westview Press,1993.
- [6]褚良才.汉学史研究的新领域:古代军语研究[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5):40-45.
- [7]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 [8]王树人.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J].学术月刊,2006(1):51-57.
- [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 [10]刘志成.论中西文化差异的语言学理据[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59-65.
- [11]吴晓明.三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J].学术月刊,2023(8):5-26.
- [12]刘华文.“名”的建构和解构:翻译名学辨[J].中国翻译,2007(6):5-9.
- [13]牛云平.从翻译到译释:创建中国译释学的构想[J].上海翻译,2016(5):6-12.
- [14]刘华文,叶君武.论汉学域界内的哲学典籍译释学研究[J].中国翻译,2016(2):5-10.

- [15]牛云平,杨秀敏.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译释学概观[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2):101-106.
- [16]徐黎,李德俊. 典籍翻译批评话语的译释学路径[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24(1):102-110.
- [17]刘性峰. 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国科技典籍英译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 [18]徐黎.《道德经》英译译释模式的历时探索[J]. 外语导刊,2024(5):148-156.
- [19]张帆,刘华文. 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译释层次分析:以《传习录》英译文本为例[J]. 外语研究,2024(2):94-99.
- [20]安乐哲. 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21]余光中. 翻译乃大道[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 [22]傅伟勋. 创造的诠释学及其应用[J]. 时代与思潮,1990(2):239-257.
- [23]王宝峰. “创造的诠释学”与未来中国哲学的创造[J]. 周易研究,2019(3):104-112.
- [24]刘性峰,魏向清. 交际术语学视阈下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的语境化翻译策略[J]. 上海翻译,2021(5):50-55.
- [25]薛国安,刘军玉,谭雪平. 六韬新说[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

English translation approaches to military terms in *Six Strategies* from a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WU Haifeng, LIU Xingfe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Six Strategies*, as a sacred classic of military science, is included in *The Seven Military Classics of Ancient China*. Its military terms have significant value in represent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ilitary knowledge system. Compared with Western military terms, 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terms possess uniqueness,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a top-down scientific paradigm, polysemous and flexible linguistic semiotic characterization, and a philosophy of the unit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uniqueness of 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terms, applying hermeneutics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military terms in the versions of *Six Strategies* translated by Nie Songlai and Sawyer. The study finds that translation approaches to military terms in *Six Strategies*, namely contextual translation, critical translation and innovative translation, can be developed based on Charles Wei-Hsun Fu's concept of "creative hermeneutics". The use of contextual translation is beneficial for text backtracking and helps the term to return to its source. The use of critical translation is beneficial for the integration of perspectives and helps to achieve term continuity. The use of innovative translation is beneficial for the sublimation of concepts and helps to achieve term innova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 hermeneutics; *Six Strategies*; military terms; English translation approaches; contextual translation; critical translation; innovative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许 金)

引用格式 吴海峰,刘性峰. 译释学视域下《六韬》军事术语英译路径研究[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5,42(1):40-47.

WU H F, LIU X F. English translation approaches to military terms in *Six Strategies* from a hermeneutic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2025,42(1):40-47.